

核心阅读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新四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当年流传的“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谣，正是拥军爱民的真实写照。这种鱼水深情，成为凝聚党心民心军心的坚强力量，成为新四军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武器。

新四军：党的初心的模范践行者

□ 陈 蓉

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新四军，在近十年的历史征程中，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成为党的初心的模范践行者。

擎起抗日重任，保障人民安定环境。日军占领长三角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沦陷区的普通群众，人心惶惶、消极悲观；被日军击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毫无斗志，军纪涣散。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新四军挺进敌后，义不容辞地擎起民族抗日的重任，带领各阶层人民群众保家卫国。全面抗战期间，新四军对日伪大小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1.79万人（另有5万多日伪军投诚），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收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万人，开创了8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也得到迅猛发展，主力部队达到21万人，地方部队近10万人，民兵96万人。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许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功业，不但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而且是由于我全体将士的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全连八十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毛泽东在《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一文中也高度评价新四军“已经成

新思想：我们时代真正的哲学

□ 余 琨

1842年，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论断——“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并在一系列文章中阐发了他对“真正的哲学”的论断。把这一论断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会贯通起来学习思考，能够深化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理解，增强对其真理性的认知、认同。

回应时代问题

在马克思眼中，“真正的哲学”既不是“证明基督教真理”的中世纪哲学，也不是不“纵论时事”“不与现实发生联系”的德国古典哲学，它必须把“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解决重大问题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恰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本质特征。

在由大向强的发展进程中，我国改革发展、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方方面面，始终面临一系列挑战和考验，这些挑战和考验既有来自外部的，又有来自内部的；既有不时出现的新情况，又有沉淀多年的老问题；既有党内认识一致没有争议的问题，又有党内说法不一、莫衷一是的问题。如果思想理论不能给出正确的判断，不能拿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不能指导实践正确地应对和化解这些问题、挑战与风险，我们的事业就会陷于被动，走入低谷，出现混乱，遭受挫折，特别是党内军内出现的政治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

亡党亡国绝不是危言耸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敏锐地捕捉这些时代性问题，不断对一系列时代之问作出新判断，提出新理念，形成新思想，部署新战略，化作重大方针、政策，并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极大改变了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军队的面貌。

表达人民呼声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把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看作人类“最高尚的职业”，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当作自己学说的终极旨趣。从这一立场出发，真正的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生动地诠释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对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需求。“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突出打好脱贫攻坚战，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让几千万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困面貌，一道迈入小康。即便连厕所这样的民生小事，习近平总书记也十分挂牵，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推进“厕所革命”，补齐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以上率下，持续纠治“四风”，

“打虎”“拍蝇”，消除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生态逐步形成。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84次提到“人民”一词，重申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誓言采取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产生实践作用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必须“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面对“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藐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作为执政党的思想理论，不但要自身正确，而且要贯彻得下去，并取得实践成果。世界上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些执政党不乏正确理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变成现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如何实践、怎样抓落实，是其理论本身的重要内容。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发生颠覆性挫折，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四个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了这一条就有了正确方向，就不会左右摇摆，遇到风浪也能闯过去。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铲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就要建设人民衷心拥护、走在时代前列、担得起执政使命的党。坚持

改革创新，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就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搞好调查研究，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当好“施工队长”，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

彰显世界价值

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富”。在这样的语境下，“真正的哲学”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引发世界性的影响和推崇，在于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困扰各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世界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许多国家碰到的世界性、时代性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它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创建人类文明的崭新道路；中国的经验也不单单是中国自己的经验，它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模式”垄断国家治理经验的局面，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普遍赞赏，既为世界上那些想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旨归。

党建视角

“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 杨富兰

刘伯坚（1895—1935年），四川巴中平昌人，是我党我军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刘伯坚一生信念坚定、爱党爱国、家国情深、人格高尚，政治工作突出，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刘伯坚自幼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很早就闻名于川北高原，保宁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任命他为苍溪县县长，但他志不在此，婉言谢绝说：“不谋高官厚禄，志在求知报国。”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中共少年共产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因成熟稳重，待人诚恳，认真负责，深受中国学生喜爱，不久便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因成熟稳重，待人诚恳，认真负责，深受中国学生喜爱，不久便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还被亲切地称作“党内驻苏大使”。在担任支部书记3年期间，刘伯坚不但要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负责重要工作的分配，还要到华工和留学生聚居的地方发表演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组织安排留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多重“围剿”，他积极组织留守部队顽强对抗，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在赣南仁风地区率部突围时，刘伯坚不幸中弹被俘，

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毫不畏惧敌人的严刑拷打，也丝毫不为高官厚禄诱惑所动。粤军的一个团长劝他要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劝说 he 只要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就可获得“自由”和“重用”，不必为共产主义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作“无谓的牺牲”。刘伯坚却铿锵有力地对这位团长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追求。他说：“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犯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这个粤军团长对此也无可奈何，还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1926年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前往苏联探求出路和寻求支援，刘伯坚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派负责接待冯玉祥。冯玉祥在考察期间，对刘伯坚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干颇为赞许和认可，便想拉拢“收为己用”。共产国际也想争取冯玉祥，就安排了刘伯坚等一批人到西北军协助工作。1926年9月，刘伯坚随冯玉祥回国后，担任国民军总政治部部长。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亲自拟写了《五原誓师词》，并在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举办各种训练班，部队很快发展到20余万人，在转战甘、宁，挺进陕西中取得节节胜利。而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等200多名干部也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取得了良好成绩。刘伯坚改造西北军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得冯玉祥等非常钦佩，他与许多西北军上层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更为重

要的是，他突破常规，大胆创新，把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改造成了革命军队，为共产党改造旧军队，尤其是政治工作方面，创造了成功经验。

1931年底，刘伯坚参与领导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毛泽东曾对宁都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起义成功后，完整的国民党一路军1.7万余人加入红军，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增加到6万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以出色的政治工作，把红五军团建成一支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这是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兵运工作的一个壮举。经过整编后，红五军团成为我工农武装的一支雄师铁军。在红军队伍中曾流传着：“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绝不会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刘伯坚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意志坚不可摧，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移狱》《狱中月夜》《带镣行》等诗篇，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拼阶级下囚，工农齐解放”的誓言。在狱中，刘伯坚写下了充满家国情怀的三封家书。在致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纹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紧靠诸兄嫂……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用处。”“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弟在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共产）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憾，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



刘伯坚

同时还嘱咐家人不要去找冯玉祥来营救自己，信中说道：“我是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自己甘心忍受，绝不会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刘伯坚留给妻子王淑振的绝命书中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最重要的，诸儿要继承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英年早逝。

刘伯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豪迈、“无需营救”的决绝以及对三个孩子的牵挂，表现了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热爱，体现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对信仰的坚守和饱含大爱的家国情怀”。

党史人物

史海拾贝